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特征分析

宋鹭

摘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历史以及国内外情况,阐述了“十四五”时期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整体判断和供给端、需求端等多方面的经济增长特征,并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展望了经济结构调整趋势。

关键词: 十四五;经济增长;增长动力;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一、“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综合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的分析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5.1%~5.5%区间,潜在就业人口为7亿~7.5亿。基于2020年100万亿元的GDP水平,预计2025年我国GDP将超过130万亿,人均GDP达到9万元。根据2014—2019年的情况测算,“十四五”期间,受到资本、人口等供给端因素和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端因素趋势性变化的影响,潜在经济增速面临持续回落的压力。

“十四五”规划没有设定具体增长目标,但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过测算,2020—2035年我国GDP平均增速需要达到

4.0%~5.4%区间,才能实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由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和模式发生转变,很多结构参数面临调整,基于传统方法测算的潜在增速难以反映真实经济趋势。增速换挡的显化将是“十四五”改革调整攻坚期的基本特征,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增长动力都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二、“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经济产生持续性的冲击,后疫情时代经济调整的不确定性增加。从国内看,金融周期下行调整期、投资周期底部波动期以及房地产去库存周期叠加,各类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均面临调整。伴随金融风险高位缓释、国有企业持续去杠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经济底部运行特征明显。

从全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一直面临“三低两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困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会更加难以预测,从而影响宏观政策实施。一方面,增长的短期波动将加剧,同时,各类周期叠加放

作者简介: 宋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①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1年“‘十四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的演讲稿整理,由中国银行研究院赵廷辰博士整理。

大了宏观效应；另一方面，中长期的趋势性减速仍未见底，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的调整也可能引发新的结构性变化。

三、供给端增长动力的结构分化特征

从供给端来看，传统的增长要素将出现明显的动力分化特征。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的年均增速将持续降低，预计资本增速降幅超过六成，劳动力增速将由正转负。此外，各供给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呈现同样的转换趋势。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率将加速放缓，但是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合计贡献率有望改善。因此，“十四五”期间单纯依靠数量投入的传统增长模式必须向依靠要素质量的增长模式转型，如何提高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供给端动力转换的关键驱动因素。

（一）资本存量增速放缓，资本规模扩张效应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存量增长率长期保持高位运行，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IMF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以 2011 年不变价格计算）已经达到 48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十三五”期间，资本积累已面临较大冲击，“十四五”时期的资本存量增速仍将维持放缓态势。按照潜在增速基准情形和资本变动趋势预测，资本存量增速将从 2020 年的 9.2% 下降到 2025 年的 7.8% 左右。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使资本形成率不断下降。我国居民储蓄率从 2010 年之后持续回落，2019 年下降到 44.4%，预计“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降至 40% 左右。假设延续规模扩张模式，按照潜在增速基准预测，到 2025 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会比“十三五”期间上升 10% 以上，可能导致投资效率进一步恶化。

（二）劳动供给数量下降，“人口红利”加速递减

“十四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和人口老龄化的“一降一升”将带来“人口红利”的加速递减。虽然当前已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鉴于全局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生活成本等经济压力不断增大，短期

内人口结构变化趋势难以逆转，需要警惕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存在超预期风险。

（三）科技创新催生新动能，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从供给端的情况来看，传统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取而代之的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十三五”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经历了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的技术进步依靠投入大、周期长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改革的边际效应递减。“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企稳回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上升。2018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 2016 年的 -0.5% 回升到 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7.3% 回升至 19.5%，这主要是因为进入“新常态”后，新一轮的制度红利加速构建并筑底回升，新动能的构建取得初步效果。按照基准情形测算，与“十三五”时期相比，“十四五”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将继续改善。但是，后疫情时代的恢复期、中美大国博弈的窗口期与中国基础性改革的深化期、创新突破的战略期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期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四、需求端增长动力的结构转换特征

需求端重点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按照历史数据和国际经验的比较拟合，2025 年，中国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将分别达到 57%、41.6%、1.4% 左右，与“十三五”时期相比，消费率提高的同时投资率小幅下降。数据显示，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五国在人均 GDP 破 1 万美元后的五年，各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平均分别提高 1.5 个百分点和下降 1.5 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的增长动力转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一）消费规模拓展与升级，需注重供给端与新需求的适配性

“十四五”期间，国内市场规模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消费贡献率有望进一步提升。2019 年，

我国零售市场规模就已超过 40 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 57.8%，但与发达国家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有较大差距。

无论是从收入结构还是年龄结构看，我国内需的释放在“十四五”期间都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通过与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人均 GDP 破 1 万美元时对比发现，上述四国当年的平均消费率比中国同期要高出 6 个百分点，其中，日本当年平均消费率比我国高出近 13 个百分点。因此，“十四五”时期消费规模的提升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从消费升级的视角来看，“十四五”期间，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部分原来由于国内供给能力不足而导致需求外流的行业，例如，医疗、留学、金融服务等，可能会回流到国内市场，从而在改善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同时带来新需求的转变。但必须提高有效供给与新需求的适配性，使提振内需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新动力。

（二）传统基建仍有发力空间，“新基建”将拉动新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并在 2011 年达到 47.8% 的峰值后逐步回落。“十四五”时期传统基建仍有较大发力空间。此外，“新基建”也会拉动新的投资增长点，创造有别于传统产业的空间。短期来看，新基建将迅速拉动投资需求，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行业都有更大的市场和应用范围。长期来看，新基建将产生外溢效应，有助于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拉动长期经济增长。

（三）外贸依存度趋势下降，新开放助力国内经济发展

基于我国进出口趋势和 GDP 潜在增速测算，我国外贸依存度有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全球化红利出现大幅下滑，全球贸易增速自 2018 年出现新探底现象。二是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停滞，国际贸易受阻，逆全球化主义抬头。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全面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的“引进来”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四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不及预期，全球市场难以继续吸纳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

但是，外贸依存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我国对外

开放程度的降低。在“双循环”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同时助力国内经济发展。第一，出口转向高附加值产品，可以同时促进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第二，进口端积极融入国际市场也可以满足国内供给端的投入需求。第三，核心资本和技术的引入可以填补国内相关产业缺口，加速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从而倒逼国内营商环境的优化。第四，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有助于其竞争能力的提升。

五、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经济结构调整趋势

从结构视角来看“十四五”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都将表现出新的特征。产业结构方面，传统产业链向新型产业链的转型机制更加复杂，新型产业链链条的动态、开放和多维性等特征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能。就业结构方面，就业风险不是总量性、系统性的，而是结构性、随机性的，并且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收入分配结构方面，收入分配改革调整进入关键期，缩小贫富差距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维持一定增长速度、促进需求模式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区域结构方面，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可能进一步加大，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增长动力及结构不同。同时，城镇化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增速将放缓，或将迎来质量调整窗口期。

参考文献：

[1] 刘元春. 坚持以我为主稳步推进经济复苏和应对大国博弈[J]. 国际金融, 2021(2): 3-5

[2] 刘伟、陈彦斌. 2020—2035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 34(4): 54-68

[3] 宋鹭. 供需两端结构优化助力“十四五”经济增长[EB/OL]. 人民网, 2021-02-05

[4] 宋鹭、于泽、刘宇琪. 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制[J]. 中国金融, 2020(5): 57-58

[5] 陈金至、宋鹭. 从土地财政到土地金融——论以地融资模式的转变[J]. 财政研究, 2021(1): 86-101

（责任编辑：冯天真）